

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与逻辑 ——基于环境社会组织生态位视角分析

钟兴菊，罗世兴

摘 要：即使面对相同的环境污染风险，为什么仅有部分环境议题被公众认知并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复合型环境治理试图弥合多元主体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但对于不同类型环境社会组织多层次建构环境问题缺乏系统讨论。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过程性比较分析，本文从组织“生态位”以及“社会建构”的过程视角提出“多元生态位—接力式建构—环境议题政策化”的问题建构解释逻辑。研究发现：（1）以环境治理事件流阶段、专业性水平与功能定位标准，可将环境社会组织划分为前端、中端和后端/末端三大生态位。（2）多元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成功建构环境问题的行动策略凸显多阶段协同合作的特征，即多层次资源动员、立体式全媒体为我所用、多元化媒体符号的形象表达、环境正义多层次实践以及制度内外策略性呼应等。（3）通过自上而下环保意识觉醒以及自下而上公众环保行动倡导过程，形成环境主张从专业话语到公众行动实践的接力式建构模式。

关键词：环境社会组织（ENGO）；环境问题；接力式建构；生态位

中图分类号：F1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1)01-0070-1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1.007

一、引 言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环境问题不断涌现，大量跨区域与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受到广泛关注，既有研究侧重从环境治理策略与模式等方面进行讨论^{[1][2]}。然而，环境问题化是环境治理的前提条件^[3]，发现和形成问题常常比解决问题更加困难^{[4](P19)}。问题化，即环境污染问题的发现与形成过程，是公众对环境污染的认知与反映结果。一方面，中国环境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且环境治理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然而另一方面环境问题却在持续恶化。是环境质量在下降，还是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标准不断提升？面对相同的环境污染风险，为什么有的环境议题被公众认知并提上政策议程，而有的环境问题却被大众忽略？哪些因素影响公众环保认知并建构环境问题？建构的过程与机制是什么？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凸显规范性环境政策话语与通俗化公众话语之间的断裂现象，专家与公众“各说各话”，难以“有效参与”统一决策过程并做出“共同”决定。十九大报告指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环境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研究”（16CSH06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技创新专项“‘以公众之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类型与策略选择”（2019CDJSK01XK01）

作者简介：钟兴菊，社会学博士，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zhongxingju2007@126.com（重庆 400044）；罗世兴，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环境社会组织^①与公众成为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力量。同时有研究表明,环境社会组织善于运用媒体,从事专业化的活动,将某些环境问题引入政治议程,从而协助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5](P29)}。由此可见,环境社会组织具有专家与公众双重角色与桥梁作用,通过自上而下的通俗化政策解读与自下而上的规范性公众行动倡导,建构环境问题。

已有研究将环境社会组织视为动员公众参与的主要力量以及协助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主体,但较少关注到环境社会组织具有连接权威规范性话语与公众通俗性话语间断裂的独特优势,可以形成以“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上下联动、合作建构环境问题的网络。此外,环境社会组织并非铁板一块,不同“生态位”类型的环境社会组织基于功能互补,形成共同建构环境问题的组织间合作网络。据此,本文以社会建构理论与组织“生态位”间合作网络视角为基础,根据从事水污染治理的环境社会组织^②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社会组织多层次协同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策略与机制路径。

二、文献综述

文献梳理发现,对环境问题形成机制的探讨主要有两种竞争性视角:客观的结构主义与主观的建构主义。二者均以“政策之窗”作为环境问题触发与建构形成的标志。

第一,结构主义视角预设环境问题客观存在,观察与分析环境污染现象时关注宏观社会过程与社会结构要素间的联系^{[6](P9)}。该视角认为历史、社会与文化中的事件、行为都是由结构决定,在分析环境问题时应将其视为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有学者从政治机会论视角分析发现,环境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博弈关系呈现出三种类型:低意识形态与政治敏感性形成依赖与合作关系^{[7][8]},以政治机会环境获得合作行动空间^{[9][10]};低政治性生态议题为基础的自我设限的抗争^{[11](P22-45)},在集体抗争活动中的“集体后退”策略^[9];从事政治敏感性较低的环境教育倡导活动。

第二,建构主义视角从过程的、动态的角度看待社会现象,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社会事实”^[12],强调社会现象的主观性、过程性^{[13](P74)},具有不依赖于“有问题的”客观状况的自我构成属性和活动特征^[14],也即环境问题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建构主义视角不否认关注过度污染现象的正当性,但认为环境社会学家的中心任务是揭示环境问题是某种动态的定义、协商和合法化等社会过程的产物^{[15](P32)}。既有研究从微观主体实践视角侧重探讨环境社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共构”环境问题模式中的主体之一,与媒体形成共同建构环境问题的亲和性,凸显凝聚与扩大公共舆论、连接整合利益与资源等特点^{[16][17]};ENGO在环境问题建构中发挥推动议题形成和传播^[16]、环境问题转化环境议题、案例风险“问题化”制度化倡导^[18]等阶段性功能定位作用。环境社会组织通过议题加工与包装将私域“环境维权”拓展为公域的“环境保护”议题以获得更多公众参与,同时利用“寻求合作”、“利用媒体”等策略拓展重大议题的行动空间,既敦促政府改善决策模式,又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实践空间^[19],但往往受到污染受害主体自我保护意识的局限,不利于议题空间的建构与拓展。

① 环境社会组织,也称为环保社会组织、环境/保非政府组织、生态类社会组织等。在本文中,环境社会组织与环保社会组织提法等同,简称为 ENGO。

② 本研究以水污染现象作为环境问题建构的对象,原因包括以下方面:(1)2018年中共中央提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的三大保卫战,其中,水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历时最长、公众关注最直接、参与方式与途径比较便利的环境问题。(2)相较于大气污染的不确定性、土壤监测难度大以及非公开性等特点,水污染的公众参与具有便利性、可见度高以及门槛低等优势。(3)当前从事水污染防治议题的环境社会组织较多,为本研究进行比较案例分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环境问题形成机制的探讨有利于触发环境污染现象议题,开启污染治理的“政策之窗”。问题产生先于政策。人们可能将困扰大多数人的问题转变成公共政策议题,“政策之窗”是“把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变成公众争论”的触发机制,将问题感知和政治行动的要求建立联系。问题流、政治流和政策流结合,共同开启“政策之窗”,或因为紧迫问题而敞开,或由于政治流中的事件而敞开,但数量稀少且时间短暂^{[20](P155-183)}。鉴于国际大规模环保运动与国内环境问题严峻性的双重压力,自197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环境会议,标志着政府开始重视环境污染问题并不断建立完善环境政策体系,开启了中国环境问题的“政策之窗”,但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出现“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现象,公众与社会组织长期缺席环境治理。由此可见,问题流只能作为“政策之窗”的前提与出发点,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与建构是推动环境污染现象走向公共议题并进入政策议程的关键环节。有研究尝试构建环境问题演进的理想路径,即包括“环境污染—社会影响—社会反应—社会问题”四个阶段,然而因科学认知、技术呈现不足,或是社会影响隐蔽、社会反映不足等困境导致环境问题建构的失败。因此,科学认知、技术呈现是污染现象是否成为环境问题的基础性前提^[3]。从科学认识转化为公众看得见的技术测量结果需要经历一个公众化的过程,但较少研究分析实现科学认知向通俗易懂的符号与话语转化的过程。以“政府主导型”的环境治理“失灵”困境还表明,政府主导的规范性政策话语与公众通俗化实践话语的脱节,导致问题流与政策流的断裂,使得部分环境风险议题因缺乏公众关注而难以进入政策议程。

与结构主义探究环境问题客观存在的原因、影响与治理策略等内容不同,建构主义从过程的、动态的角度聚焦于环境议题“问题化”的过程。在复合治理背景下,ENGO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相比于一般公众,具有较强的利益整合和表达功能,在环境问题建构中凸显议题推广和行动空间的拓展功能。大量研究侧重从结构主义视角分析环境社会组织与政府、媒体、公众等多元主体的治理实践,也有侧重媒体视角对环境污染现象话语建构的讨论,但对ENGO与多元主体互动实践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环境治理“政策之窗”触发机制条件形成等缺乏深入探究。此外,环境社会组织并非一个整体性单位,不同类型的ENGO在建构行动中功能优势与条件约制具有差异性。为此,本研究重点结合组织的“生态位”合作网络以及社会建构视角,探讨不同环境社会组织对环境议题通过自上而下实现“议题科学认知”——“在地专业实践”——“公众通俗易懂的符号与行动”转化,同时在组织间形成多层次环境问题“接力式”建构的合作行动网络的过程与机制等问题。

三、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一) 理论视角: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与组织间合作网络

社会建构认为日常生活现实被普通社会成员在社会行为中建构出来^{[21](P85-87)}。Kitsuse等认为,社会建构论区别于传统研究,是在于认为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过程而存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只需研究问题宣称的活动过程及机制^{[22](P76)}。汉尼根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环境社会学关注于环境问题是如何被人们所认识、环境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的,也即是问题化的过程;同时强调社会问题的相对性与条件性。他更进一步提出环境问题成功建构需具备六个必要条件:(1)某种环境问题具有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2)有能够把环境主张和科学联结起来的“科学普及者”;(3)受到媒体关注,对环境问题进行真实而重要地声称;(4)用形象化和视觉化的符号和词汇将环境问题生动地展现出来;(5)对环境问题采取积极的行动而产生经济刺激;(6)环境问题宣称成功应有制度化的赞助者,确保环境问题建构的合法性和连续性^{[15](P82)}。在本研究中,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是指多元治理主体对环境污染议题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形成话语体系与行动策略,推动环境议题“问题化”的过程。不同社会组织对环境污染议题解读具有不同的话语体系,其背后蕴含

着话语规则与基础,即处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组织行动的空间与约制。在环境问题建构过程中,运用话语分析环境文本、意象和观念的产生、接受与策略性运用^{[15](P38)}。

本文以“生态位”为标准对环境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生态位(Niche)从生物学角度理解,是一种包含个体、群落或生态系统等不同层级水平对象的生命主体特质^[23],被认为是生物单元在特定生态系统中,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24],也是指个体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在本研究中,环境社会组织的生态位特指从事水污染治理的社会组织与环境治理结构互动所形成的相对位置。根据田野调查经验分析,识别生态位水平的标准包括:(1)事件流阶段,组织参与环保事业发展的阶段与位置;(2)组织专业性水平;(3)在特定位置中的功能定位。三大标准相互作用并受到政策环境的约制,将环境社会组织划分为前、中、后/末端三种类型(如图1所示)。前端环境社会组织包括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环境社会组织,专业水平较高,但数量较少;中端环境社会组织包括合法注册的地方性社会组织,是当前中国环保力量的主力军;大量处于后/末端未注册的环境社会组织,以从事灰色地带活动为主,由于缺乏统计数据而数量不详。组织发展数量的分析表明,前端、中端与末端生态位的 ENGO 大致呈现“橄榄型”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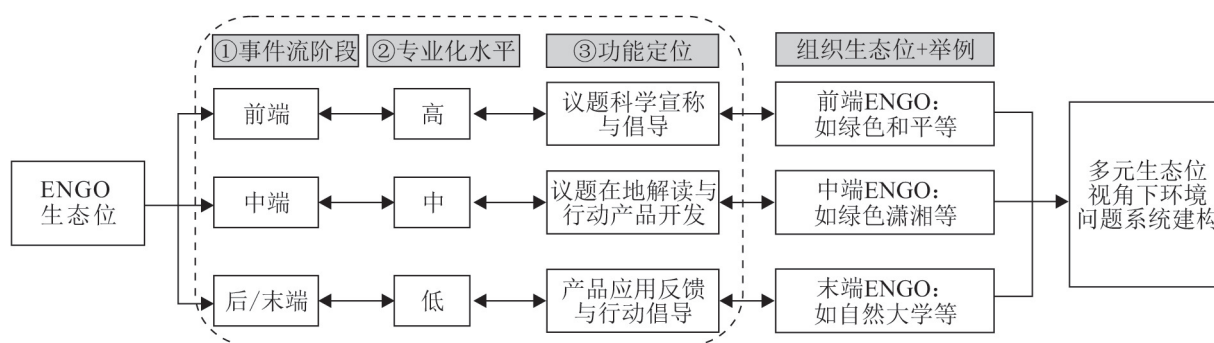


图1 ENGO生态位划分与案例类型

不同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如何自发形成环境问题建构的合作行动网络联盟?资源交换理论认为,当一个组织拥有对另一个组织来说有益但却不具备的资源或能力时,组织将会建立联盟,以获得隐性知识、互补技能、新技术和提供超越组织能力限制的产品或服务的能力^[25]。ENGO组建的联盟表现为弱联结与强联结两种模式,其中弱联结运作过程是在遇到某一可以表达的环境议题后,由一个或多个 ENGO 发起,在征得其他 NGO 授权同意的情况下,以多家 NGO 联名的形式向社会传递观点与态度,联合表达,扩大影响与关注^[26]。社会组织间普遍的松散联合产生积聚效应,使得原本弱小的单个组织通过独特的联合机制,发出能够影响社会的声音。有研究表明,社会组织间自合作网络成功包括四大因素:一是以互助关系形成机构间信任;二是达成广泛共识的制度化;三是以优势互补形成资源供给链条;四是构建去等级化的弹性运作机制^[27]。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基于资源互补需求,自愿纳入合作网络中,被赋予并承担责任。合作所带来的相互增权和总体增值是维持合作关系的动力^[28]。也有研究认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的形成包括两个条件:一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如组织的外部政策环境约束使其需要与其他的组织合作应对变化;二是来自内部的动力,如组织间的共同利益诉求和互补空间催生合作^[29]。经验调查发现,从事水污染治理的不同 ENGO 间自然形成前端组织:“只管抛出议题”——中端组织:“要活下来,必须做专业化的在地环保行动产品”——末端组织:“与公众一起去看到水有多黑,用工具将观察到的问题曝出来,不出系统的结论”等松散的行动实践网络。由此可见,在本研究中,基于不同类型、功能定位与专业化水平的 ENGO,根据内部利益诉求动力与外部政策压力需求,自愿形成围绕环境问题建构的自合作网络联盟。

（二）分析框架：多元生态位 ENGO 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

基于建构主义视角，通过不同生态位 ENGO 形成的合作行动网络探究环境问题的建构过程与逻辑。根据环境问题成功建构的六大条件展开^{[15](P81-82)}，不同生态位的环境社会组织呈现多阶段问题建构的条件与行动策略；建构过程中凸显在横向上不同生态位 ENGO 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特定阶段的建构条件，在纵向层面环境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共同实现环境问题建构的六大条件，最终成功建构环境问题并推动政策出台，如出台《水污染防治法》（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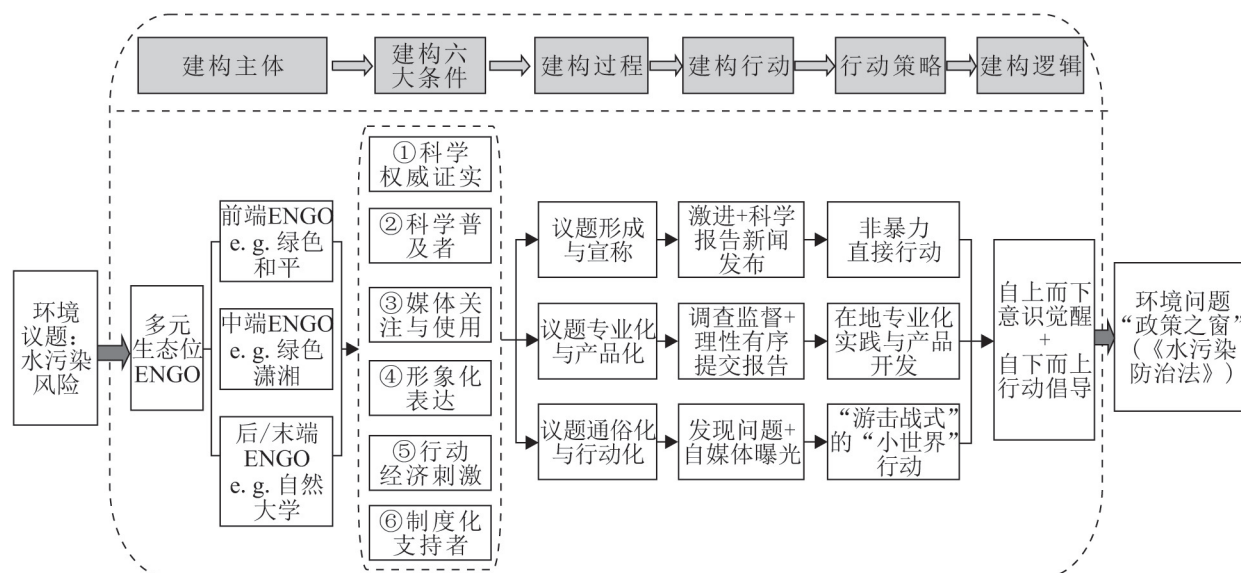


图 2 多元生态位 ENGO 建构环境问题过程与逻辑分析框架

如图所示，前端 ENGO 动员专业化团队进行现场调查，形成科学报告，并依托权威媒体进行新闻发布，为环境议题宣称提供科学权威的支持；中端 ENGO 结合地方环境风险进行在地化专业实践与行动产品开发，连接宏观科学宣称与本地环保实践，推动地方环境治理网络发展；末端 ENGO 通过一线调查实践，推动议题的通俗化普及，运用前端与中端开发的行动产品进行公众倡导与信息反馈，实现环境议题由宏观科学倡导向微观公众行动的转化。环境问题建构实质上呈现一幅以建构条件为主的环境社会组织横向多层次生态位互动与纵向多阶段建构的合作行动“图景”。对环境问题建构阶段发展进行纵向分析表明，由于 ENGO 生态位功能差异，环境问题建构过程是多元 ENGO 合作协同的结果，即“前端：推动 ENGO 的议题形成与宣称——中端：形成议题专业化与产品化——末端：推动议题通俗化与行动化”。对环境问题建构的不同阶段中 ENGO 行动定位进行横向分析表明，每阶段建构条件的实现是三大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合作行动的结果，从而形成“自上而下意识觉醒”和“自下而上行动倡导”的双重建构逻辑，最终开启环境问题的“政策之窗”。

（三）案例研究介绍与资料来源

对特定组织开展案例研究能够更深入地分析组织运行方式以及组织实践者的行动。如要解释既有现象如何形成、如何运行，或对其进行纵深描述，案例研究方法是贴切的^{[30](P6)}。本研究运用多案例研究。在理想条件下，多案例分析可以通过过程追踪分析等方法揭示因果机制。相比于单案例研究，多案例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意义，推广性较强^{[31][32]}。由于环境议题主张到环境问题的制度化保障的复杂条件以及多元化生态位 ENGO 行动实践的阶段性，单案例分析难以完整呈现所有建构条件与阶段资料信息，因此，基于多元生态位组织对环境问题建构过程采用多案例比较法。本研究对三种“生态位”的环境社会组织进行目的性抽样与深度访谈；再以环境问题建构的六大条件为

依据，对不同类型组织建构实践进行多阶段分析。有关样本组织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环境社会组织基本信息

	绿色和平	绿色潇湘	自然大学
成立时间	1971	2007（2011 登记）	2006
所在地	荷兰阿姆斯特丹（2002 年在北京设办事处）	湖南长沙	无
环保宗旨	推动公开的、有充分信息支持的环境议题讨论，以便让全社会对解决方案达成共识	致力于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提倡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通过自助型人才培养，使公众实地参与调查、探寻自然环境和零距离直面环境问题
从事领域	污染调查	本地水源地保护，行动支持网络	行动倡导环境保护
访谈对象	20180824DP	20180822SC、20180822YN、 20190330LSN	20181117ZDG、20180824DP、 20190312XB

文中所使用的文本资料来源于两种途径：（1）深度访谈。自 2017 年 7 月、2018 年 6—9 月、2018 年 11—12 月以及 2019 年 3—4 月，笔者围绕长江流域，对分布于华东、华中与西南地区的多家从事水污染治理的环境社会组织负责人约 15 人次，其中对部分组织核心负责人与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实地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获得大量有关环境社会组织参与水污染治理的一手资料。（2）二手资料。从新闻报道、组织官方网站，获得环境社会组织、环保人士等上传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报告、照片等资料，进而从多方充实与验证一手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四、多元生态位 ENGO 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分析

本研究结合组织发展阶段与政策环境空间，以生态位视角将环境社会组织划分为前、中、后端三种类型，分别选择绿色和平、绿色潇湘和自然大学三个环境社会组织作为相应生态位组织的典型案例，基于六大建构条件进行多阶段环境问题建构的过程分析。

（一）ENGO 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与策略分析

环境问题大多从科学研究中产生并提出^{[15](P99)}，这是因为普通人既没有专家的专业知识背景，也没有发现新问题的条件。环境事件的科学认知常常是环境污染问题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然而有些“环境污染”问题对于科学家来说清晰明白，但在公众层面却并非如此，因此，把一般的科学原理转化为民众可视或可理解的技术呈现非常重要^[3]。环境公共问题纳入制度化议程的前提条件是环境问题影响范围较广并受到大多数人关注，公众环境关注度能有效推动地方政府改善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33]。多种条件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动态多元化的环境议题网络。

1. 议题形成与宣称：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是环境问题建构的起点。为了证实环境问题的科学性，ENGO 采用不同方式：一是前端绿色和平通过现场调查取证或间接行动宣传方式，证实环境问题的科学性。一方面通过强大的专业化团队开展深度调查研究以获得一线权威的环境数据并形成系统性的调查分析报告。“我以前做一个自然保护区破坏案例，调查自然保护区的法律规定、卫星图像，写报告都有人专门负责，十几个人的团队相互配合从各个方面补充论证材料。（访谈资料：20180824DP）”另一方面通过发布会、国际媒体等方式公开发声与倡导，主动回应公众疑问，并与科研院所联合发布报告，进一步论证报告的科学性与合法性。二是立足本地的中端绿色潇湘，将宏观科学调查报告与在地环境问题嫁接，通过在地调查检测，形成区域性的污染调查报告，提交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开发培训课程与工作法等推广专业化解读与产品化实践。“我们

开发清水为邻项目,巡河宝小程序等方法和工具供大家使用,通过‘护源行动’将调查的建议函和调研报告邮寄到政府。(访谈资料:20190330LSN)”三是负责产品推广的一线环保行动者自然大学则主要通过一线行动倡议等方式,将专业化产品进行大众化普及。“空气污染议题撕开口子后,就到全国各地倡导公众为祖国检测空气、拍照片等活动,通过连接资源将潇湘开发的巡河产品向公众普及推广。(访谈资料:20180824DP、20181117ZDG)”

为了实现宏观的科学议题转换为通俗化的大众行动实践,不同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发挥资源动员的“接力”优势,采取多层次资源动员与合作主张宣传环境议题的策略。首先,具有专业化与时空延展性优势的前端环境社会组织,通过动员国内外科学团队进行实地调查并形成专业化的报告,同时运用国内外媒体资源进行发布;其次,具有在地化与合法性优势的中端环境社会组织,动员当地正式与非正式资源系统,通过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对在地环境问题进行专业化解读,并对产品化环保行动进行科学论证,合法有序提交污染调查报告,与当地政府建立信任与例行沟通机制;第三,具有一线行动倡导优势的末端环境社会组织,通过动员当地公众对环境风险进行自力救济。以上即为不同 ENGO 推动宏观的科学环境议题主张走向中观的专业化以及微观的通俗化行动实践的发展路径。然而,具有科学权威支持和证实的环境主张又是如何得以通俗而形象地传达给公众的呢?

2. 议题普及:具有环境专业知识背景的科学普及者。ENGO 通过与专家、记者等合作,对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进行解读与发声,以扩大环境议题的公众关注。一是前端的绿色和平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知名智库、政府部门等合作,通过研讨会、合作项目等方式对国家环境政策实施情况、污染信息公开、产品设计开发等进行分析研究,撰写科学研究报告,引起政府和公众关注。“我们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建立合作研究团队,对案例进行系统性分析与发布调研报告,并根据观察到的内容、问题成因、解决办法,提出具体的政策或应对策略。(访谈资料:20180824DP)”二是在地中端绿色潇湘致力于“整合在地环保力量”,联合全国或地方科研机构、高校学者、环境专家等论证发布报告以扩大影响力。“我们与湖南绿色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报告,邀请国内知名大学老师进行合作研究,中山大学的 Z 老师是湖南人,也是我们的顾问,共同探索组织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访谈资料:20180822SC)”三是自然大学自身作为科学知识的一线践行者与公众引导者,连接上游科学与本土化经验实践,对一线环境问题快速反映;同时充分利用自身社会组织网络,动员组织网络中的大 V 影响力,扩大公众环境知识宣教效果。“我们只讲看到了水有多黑,PH 是多少,把观察到的问题通过媒体曝出来,之后便有大量的媒体关注我们。(访谈资料:20180824DP)”

基于组织发展的特定政策环境空间,ENGO 寻求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公众等合作以获得行动的合法性。环境社会组织拥有的“科学普及者”的社会资本不同,前端 ENGO 通过与高层次、国际性科研机构等合作,实现环境问题的科学化分析与全球关注;而具有在地优势的中端 ENGO 则通过与国内和当地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建立合作关系,针对基于地方性案例的学术研究进行发声,以获得当地政府与公众的信任与支持;而将自身作为环境科学知识宣传实践者与地方经验总结者的末端 ENGO,则通过资源动员,组织开展讲座与行动实践,进行科学知识宣传普及;同时自下而上探索本土经验对环境问题的有效回应。不同生态位 ENGO 及其动员的多方资源成为环境问题的“科学普及者”,通过“宏观专业性”——“中观在地化”——“微观经验性”三个阶段,将共享的“科学权威”进行在地化与经验化解读与实践。那么,经过专业化和通俗化解读的环境问题如何引起媒体注意呢?

3. 议题传播:立体式全媒体的多层次注意,建构议题传播的“全景图”。媒体呈现与关注对于环境主张转化为问题并上升为政策关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媒体报道,一个早先的问题进入公共话语领域或成为行政过程一部分的可能性很低^{[15](P83)}。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不同生态位 ENGO 在媒体使用中呈现多元化分工与功能互补的特点。一是前端绿色和平作为全球性的环境社会组

组织,通过国际媒体或全国性媒体发布权威的环境污染调查报告并引发广泛关注。绿色和平发布的报告被《纽约时报》、《卫报》、《财新周刊》等众多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同时引发国内媒体《南方周末》等深度报道。二是中端绿色潇湘作为在地专业化的环境社会组织,利用地方媒体、组织公众号、非正式关系网络、微博等方式对地方污染调查报告进行发布与宣传,推动地方政府的及时回应与公众的关注。“开始我们想让地方媒体报道,但媒体不愿意,我们就在自己的公众号推送,当晚转发超过十万。环保厅处长在微博上回应,也有省外的一些媒体开始关注并报道此事。(访谈资料:20190330LSN)”三是“以行走的环保实践”为特征的自然大学,通过个人公众号、网络社群、微博、公益电影等形式对受到环境污染风险威胁的当地公众进行宣传与倡导,动员与培训公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并监督环境问题等。“我们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很会运用媒体,在案例推动背后有线上协作社群支持,现场发现问题,分享或直播到社群,大家从各个角度提供建议协助……不断通过自媒体曝光案例,其实就会发现在开始改变。(访谈资料:20181117ZDG)”

不同生态位 ENGO 基于议题内容采用多元化的媒体策略,从单向传播拓展到立体式网络化传播,实现环境信息受众的全覆盖。首先,前端 ENGO 基于专业网络资源链接国内外权威媒体,通过正式化且科学化地进行自上而下的环境议题传播,形成环境风险的“广而告之”关注;其次,中端 ENGO 结合宏观环境议题与本地环境污染问题焦点,运用地方媒体和自媒体进行“在地化”传播,形成地方性环境问题的特定“舆论压力”,强化地方政府的重视与公众注意;最后,末端 ENGO 将地方环境问题与利害相关公众的环境风险结合起来,借助新媒体形成的“云端”社群协作平台进行实时性、交互性的大众化网络传播,推动公众环境注意转化为“遍地开花”的环保参与行动。多元生态位 ENGO 通过“国内外权威媒体——在地化媒体——个体化自媒体”,对环境议题进行“上下联动的全程媒体,形式不拘的全息媒体以及突破地域边界主体的全员媒体”立体式传播,从宏观科学的“广而告之”到“在地化舆论压力”,再到“大众化传播实践”的路径,构建环境议题传播的“全景图”。那么,环境社会组织与不同层次的媒体合作如何形象化呈现环境议题?

4. 议题传播的艺术化:多元化符号和形象词汇表达,建构议题“大众化”演绎过程。环境主张的符号和形象词汇修饰与解读是科学化走向大众化的重要途径。符号能够迅速捕捉住人们以一种模糊分散的方式感觉到的现实,具有重要的聚焦作用^{[20](P92)}。不同生态位 ENGO 采取多样化方式,有针对性地向一般大众、政府、利益相关者等主体形象化地呈现环境风险议题。首先,“非暴力直接行动 (Non-Violent Direct Action)”是绿色和平的行动准则。媒体通常将绿色和平的行动形容为极富创意又精心策划的“环保秀”和“行为艺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网络签名等活动增加曝光度,提高公众对污染问题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如盛世长城为绿色和平打造环保主题 Campaign——“饮水儿童”,用行为艺术警示人们关注中国日益严重的水污染危机^①。其次,绿色潇湘坚持“本地人解决本地环境问题”宗旨,组织公众举牌呼吁、拉横幅、签名以及行动产品化等表达诉求,以得到地方政府重视与公众参与。“我们去大坝上面举牌说截污没有完成,倡导以后水退下去了;也曾联合湖南省水利厅文明办等共同发起‘节水护水在行动’万人网络倡议签名活动。(访谈资料:20190330LSN)”三是自然大学通过设立公众环保课堂,定期开展环保主题讲座和观影等活动,通过行动引导公众认识自身面临的环境风险并参与环保行动。“我们到污染风险当地组织公众观看‘水与村庄’系列片,帮助公众了解水与生活以及环境保护的关系。(资料来源:20181117ZDG)”

科学性知识走向通俗化常识的距离也是多元媒体通过形象化方式表达并建立与公众关系的过

① 资料来源:广告门的伙伴们:《“绿色和平”环保 Campaign:“饮水儿童”》, <https://www.adquan.com/post-1-15030.html>。

程。多元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运用阶段化策略与公众建立“亲和性”，以推动环保行动的公众参与。前端 ENGO 所运用的国内外专业权威媒体，通常对发生在异域时空背景中的环境事件通过夸张的“行为艺术”使人们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有利于突破时空维度，超越个人感觉和情绪，进而形成群体环保意识和行动共识^[34]。为了进一步将“他域”印象与“在地化”环境问题建立关联，本土化环境社会组织运用当地媒体或自媒体发起污染调查活动，向当地政府提交调查报告与汇报污染监督进程，对公众签名等活动进行实时传播，为宏观环境议题的宣称印象赋予在地化的实践载体。为了打通环境议题风险印象到公众化行动的最后一公里，末端环境社会组织运用新媒体平台以及行动式陪伴，与环境风险利害相关群体形成“共识圈”，倡导动员环境风险情景中的公众通过举报与曝光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多元化媒体符号的形象化表达实际上是通过“全息”实现“全员”媒体的过程。媒体传播发声形成的共识有利于创造一个大共同体，通过符号和象征分享经验。联合或联结行动是创建共同体的条件，为此，基于形象化符号的多层次表达构建环境关心与公众行动的三大共同体，即突破时空维度的全球环境正义公众、在地化环境关心公众以及环境风险利害相关公众，从而为科学知识到大众化常识的演绎主体提供一种类型分析途径。那么，不同生态位 ENGO 又是如何动员多元主体采取环境行动呢？

5. 议题的行动转化：采取行动可获经济收益。公众参与是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关键。既有研究表明，低成本视角下的利己主义是环境行为的主要动因之一^[35]，而环境社会组织的环保实践作为一种组织化行动有利于突破个体化理性选择困境。基于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以及利益相关性，不同 ENGO 如何引导具有高度利益分化的公众从“关注环境风险”到“参与环保行动”转变？对环保行动的回报考察成为环境议题建构的关键转折点。首先，作为国际组织代表的绿色和平关注全球环境问题，以环境正义原则倡导公众环保意识觉醒。绿色和平呼吁保护水资源，即是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在地化环保行动的绿色潇湘则坚持“本地人解决本地问题”的行动原则，以社区为本的环境利益为目的组织倡导“环保湘军”建立“使命共同体”。“典型湖南人形象是穿着草鞋，一介布衣，心忧天下，爱管闲事，喜欢打抱不平、混论坛、看报纸，乐于公共参与，我们称为‘环保湘军’。我们做家乡环保是为了让家人有干净的空气与水，所以现在很多社会组织都是本地人。我们把市民带去水源地走访，与他们喝水切身相关，他们非常乐意参加。（访谈资料：20180822SC、20190330LSN）”三是处于生态位末端的自然大学以污染受害者的环境风险补偿为“痛点”，动员污染受害者以维护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环保自力救济行动。“我去污染企业，就像职业的调研记者一样，花一个星期和企业周边的利益相关群体打成一片，不断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情景，找到他们的痛点，把他们凝聚起来，同时去推动环保部门回应我们的诉求。（访谈资料：20181117ZDG）”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公共性与不确定性特点推动环境保护从传统的“环境靠政府”转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复合治理体系。面对环境污染风险，公众作为“理性人”，根据环境污染受害程度进行理性选择，出现参与失灵困境。以组织化参与环保实践有利于突破个体化理性选择困境，行动回报成为推动高度利益分化公众环保行动的途径。以形象化符号传播方式建构以公众为主的三大环保行动共同体，并从不同层次解读“环境正义”的实践内涵：前端 ENGO 基于全球环境正义，呼吁突破时空约束的公众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环境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平衡；为了将抽象模糊的全球环境正义与家庭、集体和社区的环境利益建立关联，在地化的中端 ENGO 基于本土环境问题建立以社区为本的“使命共同体”，实现环境利益区域性与群体性的统一；末端 ENGO 陪伴环境污染受害者共同行动，以粗放的举报与曝光等方式引导受害者进行“游击战”式等自力救济以维护自身权益，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多元化生态位 ENGO 与公众共同体在环保行动中，对“环境正义”使命形成“全球化环境正义——社区为本的环境正义——个体性环境利益补偿”的多层次解读，从而为公众参与失灵现状提供一种合理解释。环境污染受害者为

利益补偿诉求的抗争,实质上作为宏观环境公益价值的一种微观基础,从而基于环境公益与私益的统一,构建公众与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行动体系。那么,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以及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参与行动诉求,政府如何进行回应?

6. 议题的合法性保障:制度化的支持者。“把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变成大多数公众的争论”,将问题感知和政治行动的要求建立联系作为“政策之窗”开启的触发条件。然而,大部分环境议题一旦抛出便进入漫长的宏观认知阶段而缺乏公众行动。环境污染风险如何从个体局部困境演变为公众关注,并最终引起政府重视以及上升到政策议程,从面上回应环境问题?不同生态位 ENGO 在环境问题建构过程中,凸显功能互补的制度化支持演进路径。一是前端绿色和平基于环境正义使命聚集科学团队形成的调查报告,依托国内外媒体进行传播,通过“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环保行动表演艺术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为环境议题直接进入环境问题的制度化议程创造契机。2013 年,绿色和平成功推动壬基酚等有害化学品纳入《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重点防控化学品名单。二是中端绿色潇湘作为在地专业性社会组织,通过打通政府与公众微博互通机制,合法有序提交调查报告,以动员孩子“给市长写信”等特色项目与政府建立例行沟通机制,获得行动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守望者发布污染问题的微博,省里的两位官员朋友就会去转发,@当地环保局跟进,让地方环保局觉得上面有人在支持……动员参与‘上游一公里’的小朋友给市长写信,建立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例行沟通机制。(访谈资料:20190330LSN)”三是处于末端的南京大学以“一线行动为主线”的制度外参与实践,虽然组织分散、规模小,但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自由性。“我们偏向于个人的做事方式有一个优势,一个地方折腾不成功可以换地方……北京把事情挑出来之后地方组织就有干预的理由了,为一些污染案例或者本地的污染问题撕开口子。(访谈资料:20180824DP、20181117ZDG)”

基于生态位的“优势互补”,环境社会组织采取制度内外两大行动策略形成内外呼应,上下联动倡导环境问题的制度化进程。一是通过制度体系外的舆论造势与行动倡导策略推动环境问题的宏观关注与利害相关者行动,即前端 ENGO 运用国内外权威媒体优势,形成舆论压力,倒逼相关部门重视,并与社会组织建立例行沟通机制,通过专业化倡导合作,推动环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快车道;而处于末端的 ENGO 则以“一线在地行动”优势,倡导环境风险利害相关公众采用流动作战方式,创造制度外自由行动空间,同时避免身份合法性的困境,形成“凝聚的一团散沙”联盟行动模式。二是为了形成制度内外行动呼应,作为在地环境保护主力军的中端合法性环境社会组织,通过污染监督调查取样、提交污染调查报告、动员公众“给市长写信”等行动产品与政府建立良性的沟通模式,从而有序、合法倡导环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多元生态位 ENGO 通过制度内外行动呼应策略,形成一套合法化政策倡导的“接力”联动逻辑:即“超越制度约制的舆论压力造势——制度内的信任与有序沟通——游离制度外的流动作战快速反应”。由此可见,多元化生态位 ENGO 推动环境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组织行动合法空间约制下的策略实践,通过边缘化博弈实践不断为“政策之窗”创造政治行动关注与问题感知的行动空间。为此,ENGO 的博弈实践呈现出从“挑战型舆论影响”到“温和型沟通合作”以及“边缘型流动作战”的内外呼应与联动,推动环境问题获得制度化的回应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的合法化支持。

环境社会组织通过“议题形成与宣称——媒体关注与形象化传播——在地大众行动与制度化保障”六个阶段“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实现宏观科学化的环境议题到在地化的公众环保行动实践,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环保意识觉醒与自下而上有序环保行动”联动构建环境问题的逻辑。ENGO 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凸显为一幅基于纵向多阶段环境议题向行动转化的系统性行动策略与横向多层次环境问题建构条件策略体系形成的接力式联动的“全景图”,从而开启环境问题的“政策之窗”(如表 2 所示)。纵观多元生态位 ENGO 阶段性建构环境问题的策略逻辑,其体现为:

“前端的科学调研报告+激进式新闻发布——中端的在地调查报告+合法有序提交相关部门——末端的发现问题+自媒体曝光”。从横向的建构条件分析发现，建构过程经历“议题形成与宣称——议题传播与行动转化——议题制度化支持”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多元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基于专业化与合法性约制形成建构的策略体系：即多层次资源动员合作宣称环境议题，立体式全媒体建构议题传播的“全景图”，媒体符号形象化表达建构议题“大众化”演绎过程，环境正义多层次解读与实践形成环保行动共同体，以及制度内外呼应建构环境问题制度化支持路径等。由此可见，环境问题建构的过程即是环境议题从宏观走向微观，从科学专业化、规范化走向大众化和通俗化，从环境问题意识走向环保行动的转化过程。

表2 多元生态位 ENGO 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与策略分析

建构过程维度		ENGO 生态位各层次行动措施			建构条件策略
建构阶段	建构六大条件	前端：绿色和平	中端：绿色潇湘	后端：自然大学	
Step1：议题形成与宣称阶段	①科学权威支持和证实	科学调查报告与发布	在地专业化解读与实践，污染调查报告发布	大众化实践与产品通俗化应用	多层次资源动员与合作主张宣称议题
	②科学普及者	国内外环境资源整合	在地资源整合与建立信任	专业知识行动实践与本土经验总结	
Step2：议题传播与行动转折阶段	③媒体注意	国内外权威媒体+大众媒体	地方媒体+自媒体	自媒体+网络社群	立体式全媒体建构议题传播的“全景图”
	④符号和形象词汇修饰	“非暴力直接行动”行为艺术	行动产品化与项目化遍地开花，地方实践网络构建	一线行动实践，自媒体曝光	媒体符号形象化表达建构议题“大众化”演绎过程
	⑤采取行动可获得经济收益	环境正义的“环境命运共同体”	社区为本的“使命共同体”	受害者利益补偿的自力救济与抗争	环境正义多层次实践
Step3：议题制度化支持阶段	⑥制度化支持者	社会舆论加速议题制度化的快车道	制度内有序沟通与支持模式程序合法化	“游击战式”的制度外“小世界”行动	制度内外呼应建构环境问题制度化轨道
建构行动策略		调研报告+激进式新闻发布	调查报告+合法有序提交相关部门	发现问题+自媒体曝光	——
建构结果		议题形成与宣称形成舆论影响	议题“在地化”实践创新	议题“通俗化”公众实践	环境问题“政策之窗”开启

（二）ENGO “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行动策略的原因分析

从 ENGO “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的行动策略发现，基于特定政策环境背景下 ENGO 的行动空间与生存发展方式受到差异性约制。本部分从政策环境、资源动员、媒体传播方式等方面对 ENGO 建构策略进行原因分析，为明确不同类型 ENGO 功能定位以及分类拓展社会组织行动空间的政策支持提供实践指导。

1. 以“合法性”为基础建构组织行动的“橄榄型”空间。有学者认为，“利益冲突议题”与“社会动员”成为环境社会组织行动自我审查的“双重小世界”边界^{[11](P22-45)}，表明政府与环境社会组织间是一种协商式共生关系，政府既对 ENGO 进行严格管控，又与之达成有意识地合作^{[36](P27-59)}。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治理时代，明确指出社会组织、公众成为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台但一直未修订的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条例对

当前组织发展凸显一系列约束性:一是“双重管理”制度(即“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导致大量末端环境社会组织因为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而难以获得合法性身份,处于灰色活动地带或退而选择工商注册,后端 ENGO 以粗放式“一线行动实践”以获得制度外自由行动的“小世界”空间。二是基于“属地管理”以及业务范围的“非竞争性”^①,引导在地合法注册的 ENGO 开展“专业调查报告”以及有序监督,然而作为中端专业化环保行动的“主力军”却难以突破地域限制,进而寻求与前端和末端组织建立合作关系网络以拓展行动空间。三是境外环境社会组织的限制性发展导致前端与中端 ENGO 发展不足。2017 年开始施行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开展临时活动未经备案的,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或者变相开展活动,不得委托、资助或者变相委托、资助中国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导致自 1990 年代前后大批进入中国的境外环境社会组织由于缺乏注册资质陆续退出,部分国际 ENGO 只能通过临时备案方式在“特定区域、特定议题”开展活动,如处于前端的绿色和平以“备案制”方式围绕特定议题在特定区域空间以“行动带来改变”为使命开展激进的环保活动。

由此表明,在特定的环境政策背景下,基于合法性水平中端的 ENGO 明显大于前端与后端 ENGO,形塑有序参与环保行动的“橄榄型”治理空间,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功能定位以及各司其职的环境正义的“使命共同体”,前端 ENGO 运用专业团队与资源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论证与宣称,借由地方环保主力军对环境议题进行在地化解读与产品开发,并通过一线流动作战的 ENGO 行动倡导实践,从而拓展环境议题内容以及突破行动空间边界,合力实现环境问题建构。

2. 资源导向下以“生存型组织”拓展“专业化组织”的公众性空间。以资源为导向的 ENGO 发展路径呈现阶段性特点:发展早期依靠境外基金会资助,出现“去政治化”的同质发展,如大多组织集中从事环境教育、物种保护等领域^{[37][38]}。发展中期基于行业“优胜劣汰”选择,逐渐分离为两条路径:一是资源丰富、专业性强的大规模组织,偏向从事污染治理、自然教育等常规“低风险”活动^[39](P16-41)];二是资金不足、规模小的组织主要依靠志愿者的时间和精力展开行动,倾向于采取具有对抗性的活动以引起社会关注^[40]。发展后期以国内基金资助为主,侧重推动规模大、专业化强的环境社会组织持续做大做强,而处于成长期的规模较小的组织被排除在资源分配系统之外,面临因缺乏资助而退出的风险。随着 2017 年境外基金陆续退出,国内两大环保基金会(阿里巴巴以及阿拉善 SEE)占据垄断性资助地位,导致环境社会组织发展面临三大困境:资金渠道的单一化风险;对大型的专业性组织支持导致 ENGO 工作领域的同质性以及资源聚集的“马太效应”;三是凸显组织专业性水平与公众参与的悖论,导致公众性低水平参与组织专业化治理行动。

目前 ENGO 资源动员环境呈现一幅专业化优势发展型资助的生态图。一方面,专业化的环保话语与实践行动顺应国内外基金资助的方向与偏好,大规模、专业化的国内外 ENGO 占据国内外丰富的基金会资源,其通过专业化报告发布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宣称;而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在地 ENGO 将宏观环境问题进行本地化环境污染风险的解读,开发污染监督产品供一线 ENGO 使用,但同时陷入专业化水平提升与公众化动员不足的悖论;另一方面,基于早期境外基金会孵化培育的小规模、未注册的环境社会组织,以通俗化与粗放的行动倡导实践与公众建立连接,作为大型专业化 ENGO 与公众的桥梁。面对资源分配排斥的困境,新兴的小规模环境社会组织转向动员公众参与和筹款以获得“求生存”的机会。由此表明,基于专业化优势发展型资助原则,大量处于夹缝中

^① “非竞争性”是指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有关不予登记的情形中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表明在同一行政区域内除由环保部门主管的一家环境社会组织外,其他的环境社会团体与民非单位注册可能存在“非环保部门”现象。

生存的后端 ENGO 作为共同推动多元生态位的环保实践,成为搭建专业性与公众性策略的桥梁,实现“上下接力式”的环境治理模式;此外,身份合法性是获得项目支持的前提,众筹时代的到来有利于一线 ENGO 突破制度与空间限制,为获得“求生存”的资源创造契机。

3. 环境议题的融合性媒体传播与多元话语实践。环境议题通过在媒体上不断出现而获得合法性,ENGO 通过制造能够引起社会舆论关注某个环境议题事件向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关注公众的规范、利益和行为等,从而将环境议题推向政策议程^{[41](P189)[42](P472-474)}。首先,环境传播主体从单一主导走向多元话语实践。传统媒体时期,政府通过权力和资源优势,借由权威与主流媒体在环境传播的话语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信息选择权、发布权及主要流向。由于资源受限以及合法性压力,早期 ENGO 负责人通过兼具环保人士与媒体工作者的双重身份为环境传播创造有限的话语空间,如以新闻工作者身份呈现环保公益活动信息,同时为弱势群体维护自身环境生存权益提供表达渠道^{[43][44](P273-277)}。1990 年代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专业引导媒体与综合性媒体纳入环境专栏传播,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拥有实时交互优势的新媒体为公众创造了话语空间,自媒体成为公众发布与宣传多元环境议题的重要途径^{[45][46]}。其次,从议题表达来看,传统媒体以常规性议题为主,而新媒体创设大量开放性的新议题。传统媒体以生态保护与节能减排议题为主,新媒体则以各类污染议题为主。随着传统“新闻舆论场”以及现代“民间舆论场”的互动合作,环境议题以融合传播方式出现,通过新媒体创设新议题,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将网络意见推向高潮,发挥各自优点。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环境信息获取与发布获得较大的开放性和自由度,打破了精英话语和专业话语垄断,公众话语成为新媒体语境格局的重要补充,为从多元话语建构环境问题创造了条件。

研究表明,ENGO 运用多阶段媒体融合传播路径,为专业化环境问题转向通俗化解读提供了契机。新媒体的使用在打破传统话语垄断的同时,拓展了话语实践主体与空间。前端 ENGO 采取权威而专业的国内外媒体为环境问题进行激进的“行为艺术”宣称,形成面向自上而下环境问题的专家与专业话语系统;中端 ENGO 作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使用的桥梁,运用在地官方媒体维持政府的主导话语权,同时结合专业话语与在地环境问题,运用新媒体进行“本土化”的话语实践解读,形成遍地开花的行动产品与项目;末端 ENGO 得益于新媒体成本低、传播广、时效强等优势,运用自媒体和网络社群形成联盟支持话语平台,通过在地行动倡导与通俗化解读,突破专业与权威话语垄断,从而为“自上而下”多层次话语实践建构环境问题提供公众参与的现实依据。基于媒体转型发展,通过多元生态位的 ENGO 的话语实践,形成从国内外、权威专业话语到本土化、地方性话语解读环境问题的行动网络。

为此,不同生态位的 ENGO 通过组织化接力倡导实践,为建立公众环境意识到环境行为关联讨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前端、中端与后端 ENGO 的接力行动实践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基于宏观政策对 ENGO 合法性的约束。不同生态位 ENGO 通过“备案制”、“合法注册”以及“小世界”自由行动策略,持续构建上下联动的“橄榄型”行动空间,中端的合法行动空间以前端组织的环境议题宣称为基础,同时作为末端 ENGO 行动实践信息收集反馈的中转站以及专业化有序回应的重要桥梁。二是基于资助环境从国际走向国内的转型变迁,ENGO 根据专业化水平以及与公众关系距离进行自我定位,以“生存型”的行动实践倡导、“专业化”的污染调查报告发布以及在地环境问题监督等工作定位建立多层次的资源动员网络,最终形成可持续与多元化的组织发展资源动员网络生态。三是环境议题融合性传播与多元话语实践宣称。不同生态位 ENGO 基于新媒体发展与运用,打破传统的“权威与专业话语体系”,推动以公众为主的地方性多元主体共建本土化话语实践,搭建公众行动实践与专家专业话语体系之间的桥梁,推动公众环境问题意识向行动转变,从而形成“自上而下意识觉醒以及自下而上行动倡导”的环境问题立体式建构逻辑。

研究发现,组织的合法性、专业性,媒体资源动员能力与公众参与度等因素影响环境社会组织

建构环境问题。不同生态位 ENGO 对环境问题的建构过程反映了结构与行动视角下的行动者间的合作与博弈实践过程（如表 3 所示）。基于事件流阶段、组织专业性以及功能定位标准划分前端、中端、后端三大生态位的 ENGO 类型。通过环境问题建构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分析发现，前端 ENGO 以专业性与资源动员能力优势形成“议题宣称与媒体舆论影响”，中端 ENGO 以合法性为主导成为“议题在地化实践”主力军，末端 ENGO 因与公众联系具有天然优势，成为“议题通俗化与行动普及”的倡导者，通过多阶段行动实践，最终形塑环境议题“宣称与媒体舆论影响——在地化实践——通俗化行动普及”多阶段环境问题建构的过程逻辑。

表 3 ENGO 建构环境问题行动策略的影响因素分析

事件流阶段	前端：绿色和平	中端：绿色潇湘	末端：自然大学
生态位特征	高	中	低
①合法性	+	++	—
②专业性	++	+	—
③媒体资源动员能力	++	+	—
④公众参与度	—	+	++
建构结果	议题宣称与媒体舆论影响	议题在地化实践	议题通俗化行动普及

注：该表只从定性做判断，无量化含义；“++”表示在该维度上具备较高水平表征，“+”表示在该维度上具备中等水平表征，“—”表示在该维度上具备较低水平表征。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推动公众环保意识向环境行动转化，成为实现美丽中国环境治理蓝图的必然路径，其前提条件是专业的环境议题以及政府主导话语走向地方性与公众性的环境行动实践。本研究立足于组织“生态位”合作网络与社会建构过程视角，提出“多元生态位——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政策化”的问题建构过程逻辑。在特定政策背景下，基于事件流阶段、专业化水平以及功能定位将环境社会组织划分为前端、中端与后端三大生态位，通过多层次环境问题建构条件策略以及多阶段环境议题向行动转化的系统性行动策略整合，形成“接力式”联动建构环境问题的“全景图”，从而开启环境问题的“政策之窗”。为此，多元 ENGO 建构环境问题“接力式”模式体现为以下三大行动逻辑。

第一，多元生态位 ENGO “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的全景图。前、中、后三大生态位 ENGO 自上而下协同合作，推动环境问题建构的全过程：“议题形成与宣称——议题在地化实践——议题通俗化的公众实践”。经验研究表明，在特定社会结构背景下的 ENGO 参与环境治理实践呈现“生态定位”的功能差异，即以专业性为主导的前端 ENGO，以一线行动倡导公众参与为优势的后端 ENGO 以及以合法有序的在地化行动为主导的中端 ENGO。多元生态位 ENGO “接力式”环境问题建构凸显三大特点：一是多层次性。ENGO 多层次行动策略对问题建构条件的整合性解读。二是多阶段性。ENGO 通过多阶段策略行动，实现环境议题向环境行动转化的过程实践。三是协同性。环境问题科学化与专业化从宣称到公众关注与在地化的行动实践过程，实质上是不同生态位 ENGO 多层次解读与实践建构条件以及多阶段建构环境问题的合作与博弈结果，从而形成“接力式”环境问题建构的全景图。

第二，以多元生态位 ENGO 建构“上下”联动的环保行动网络空间。通过多阶段“专业化到通俗化”的解读，连接宏观科学环境议题关注与微观公众的本土化实践经验。面对环境污染风险，环境社会组织作为治理行动网络的重要主体，基于合法性、专业性以及资源动员能力等约束，在竞争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差异化优势的生态位划分。多元生态位 ENGO 协同拓展环境议题建构的

“上下”联动的行动空间：前端 ENGO 基于专业性优势利用内外媒体进行科学议题宣称，末端 ENGO 具有获得公众支持的制度外自由行动空间的天然优势，作为桥梁中端的 ENGO 以合法性优势进行在地化的实践创新以建构合法有序的地方性行动空间。有学者认为，环境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纽带，为何以 ENGO 运用媒体符号形象宣称的环境风险议题却未能引起公众关注？其关键可能在于，以政府主导的规范性环保话语与通俗化公众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断裂。为此，以生态位为基础对 ENGO 进行功能定位分析，建立连接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纽带，形成宏观科学议题到微观本土化经验实践的有序行动，构建基于政府政策倡导——社会组织专业化实践——公众环保行动的“上下”联动的环保行动网络空间。

第三，橄榄型结构的 ENGO 发挥专业化与在地化优势，形成自上而下环境意识觉醒以及自下而上有序行动回应，联动开启环境问题的“政策之窗”。研究发现，“橄榄型”环境社会组织具有两层涵义：一是 ENGO 的专业发展与规模数量结构凸显“中端为主，前后端为辅”的特点。二是揭示 ENGO 在特定政策环境背景下的行动空间的约制。合法注册的中端 ENGO 成为环境治理的“主力军”，前端 ENGO 对科学环境问题的宣称是中端 ENGO 进行“在地化”环境议题解读与创新实践的前提，末端行动倡导者 ENGO 基于公众支持优势为中端 ENGO 的有序行动拓展行动空间支持与制度外资源，从而基于前端与末端 ENGO 的行动实践，突破了中端 ENGO 的地域性与议题领域限制。末端 ENGO 陪伴式的行动倡导成为打通公众环境意识到环境行为距离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公众个体为追求自我利益补偿或以社区为本的环境正义等不同层次的实践，推动环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从而通过自上而下的环境意识的倡导与觉醒以及自下而上多元主体的合法、理性有序的行动实践，联动开启环境问题的“政策之窗”。

在复合型治理背景下，从环境社会组织的生态位视角对环境问题建构过程与策略的创新分析，有利于通过建构“政府—环境社会组织—公众”合作行动网络，从中观与宏观维度解读环境意识到环境行动的距离，从而回应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失灵”的困境。以“生态位”为基础的环境社会组织类型与功能定位分析表明，环境问题的“接力式”建构模式具有多层次性、系统性、协同性以及动态过程性等特征。

作为探索性的研究，本文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一是以目的性抽样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本文根据研究经验总结与理论视角构建 ENGO 的三大生态位理想类型，并以此作为方法论基础进行目的性抽象选择三个典型案例。实际上，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在纵向动态发展过程中同一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问题建构中可能具有多生态位特征。与此同时从横向上看，同一建构条件中不同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也呈现整合性特征，而非单一建构特征类型。二是本文侧重探究不同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对环境问题建构的过程性分析，未侧重讨论环境问题建构成效。对不同的建构条件指标以及影响因素分析采用的是基于田野调查研究经验的质性判断与解读，而非精确测量，未来将基于本研究结论的核心变量，即合法性、专业性、资源动员能力、公众参与度等的测量，采用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

- [1] 唐任伍,李澄. 元治理视阈下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
- [2] 范永茂,殷玉敏. 跨界环境问题的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理论讨论和三个案例[J]. 公共管理学报,2016(2).
- [3] 陈阿江. 环境污染如何转化为社会问题[J]. 探索与争鸣,2019(8).
- [4] [美]罗伯特·K. 默顿.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M]. 林聚任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5] Ho, P., R. L. Edmonds.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M]. London,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Routledge E-Library, 2007.

- [6] [英]泰伦斯·霍克斯.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西方人文经典译丛[M]. 翟晶,译.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 [7] 晋军,何江穗. 碎片化中的底层表达——云南水电开发争论中的民间环保组织[J]. 学海,2008(4).
- [8] 张虎彪. 环保 NGO 的政治机会空间的营造——以 C 市环保协会对政府的行动策略为例[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 [9] 郇庆治.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 [10] 叶托. 环保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制度空间与行动策略[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 [11] 晋军. 两种环保小世界:社会转型期中的民间环保组织[A]. 郭于华. 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五辑)[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12] 洪大用. 试论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学的阐释模式[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5).
- [13] 洪大用. 社会变迁与环境问题: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阐释[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4] 闫志刚. 社会建构论:社会问题理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J]. 社会,2006(1).
- [15] [加]约翰·汉尼根. 环境社会学(第二版)[M]. 洪大用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16] 曾繁旭. 环保 NGO 的议题建构与公共表达——以自然之友建构“保护藏羚羊”议题为个案[J]. 国际新闻界,2007(10).
- [17] 龚文娟. 约束与建构:环境议题的呈现机制——基于 A 市市民反建 L 垃圾焚烧厂的省思[J]. 社会,2013(1).
- [18] 乔永平,郭辉. 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与模式探究[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
- [19] 谭爽,任彤. 我国环境抗争中社区自组织与民间环保 NGO 之比较——以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反建事件为例[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 [20] [美]约翰·W. 金登. 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 丁煌,方兴,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21] Berger, P. L., T.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6.
- [22] Kitsuse, J. I., M. Spector. *Constructing Social Problems* [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87.
- [23] 彭文俊,王晓鸣. 生态位概念和内涵的发展及其在生态学中的定位[J]. 应用生态学报,2016(1).
- [24] 朱春全. 生态位态势理论与扩充假说[J]. 生态学报,1997(3).
- [25] Hardy, C., N. Phillips, T. B. Lawrence. Resources, knowledge and influence: The organizational effect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3(2).
- [26] 董志锋. 动员结构与自然保育运动的发展——以怒江反坝运动为例[J]. 开放时代,2009(9).
- [27] 杨柯. 社会组织间自合作成功的关键因素探讨——以“5·12”汶川地震陕西 NGO 赈灾联盟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2015(8).
- [28] 徐浩,张永理. 灾害救援中非营利组织的自合作趋势及其行动逻辑[J]. 中国行政管理,2014(10).
- [29] 李洪佳. 组织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多主体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研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3).
- [30] [美]罗伯特·K. 殷. 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原书第 5 版)[M]. 周海涛,史少杰,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
- [31] 黄振辉. 多案例与单案例研究的差异与进路安排——理论探讨与实例分析[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0(2).
- [32] 李朔严. 政党统合的力量:党、政治资本与草根 NGO 的发展——基于 Z 省 H 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J]. 社会,2018(1).
- [33] 郑思齐,万广华,孙伟增,等. 公众诉求与城市环境治理[J]. 管理世界,2013(6).
- [34] 颜景毅. “参与”的传播:社交媒体功能的杜威式解读[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12).
- [35] 周志家. 环境保护、群体压力还是利益波及——厦门居民 PX 环境运动参与行为的动机分析[J]. 社会,2011(1).
- [36] [荷]皮特·何, [美]瑞志·安德蒙. 嵌入式行动主义在中国社会运动的机遇与约束[M]. 李婵娟,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 [37] Yang, G. B.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5, 181.

- [38]Zhan,X.,S. Ta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policy advocacy of environmental NGOs in China[J].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3(2).
- [39]Carl,M. *Community Organizations:Studies in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Exchange*[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 [40]Dalton,R. J. ,S. Recchia,R. Rohrschneider.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nd the modes of political action [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3(7).
- [41][美]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第二版)[M]. 曹荣湘,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42][美]罗伯特·K. 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 唐少杰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 [43]何平立,沈瑞英. 资源、体制与行动:当前中国环境保护社会运动析论[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44]郭小平. 环境传播:话语变迁、风险议题建构与路径选择[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 [45]李淑文. 环境传播的审视与展望——基于30年历程的梳理[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8).
- [46]陈虹,潘玉. 从话语到行动:环境传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模式[J]. 新闻记者,2018(2).

Relay Construc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Logic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O Niche

ZHONG Xing-ju, LUO Shi-xing

Abstract: Even for the sam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risks, only a few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recognized by the public and enter the public policy agenda. Why?Compou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ttempts to bridge the multiple subject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atic and dynamic phases of multi-level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by different types of ENGO. Based on the proces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typical cas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problem construction explanation logic of “multiple niche—relay construction—environmental problems politic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nich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Based on the standard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vent flow stage, professionalism an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ENGO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niches: pre-niche, mid-niche and post-niche. (2) The multi-niche ENGO’s action strategy for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highlights the multi-stage integration characteristics: multi-level resource mobilization, all-media use, image expressions diversified media symbols, multi-level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rategies echo etc. (3) Through the awakening of top-dow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the bottom-up publ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vocacy process, a relay construction model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from professional discourse to public action practice is formed.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ENGO); environmental issues; relay construction; niche

(责任编辑 朱 蓓)